

前 言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和经济上最有活力的新兴强国。它想要在下世纪成为伟大的强国。如果它保持政治稳定和高经济增长率，它将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它的对外政策如何演变，将会影响到世界力量均势，其影响方式不但对中国人来说是重要的，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中国怎样纳入世界，将决定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能否成功建立。

中国的某些邻邦把它看作一种威胁。然而中国的态势是防御性的。美国人认为可能有利的新世界秩序，在中国看来却是有危险的。美国与亚洲和欧洲远隔重洋，与美国毗邻的两个国家比美国弱得多，而且是它的盟邦。中国则是位于亚洲的中心，周围有一批强大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美国拥有技术先进的工业经济，人口疏散在肥沃的农业平原，生产的粮食多得本国人口吃不了，而中国的人口却庞大得多，其中大多数是拥挤在靠近海岸线、仅占它领土22%的地方。人口的增长使粮食供应受到的压力达到极限，而大部分的领土却是人烟稀少的山地和荒漠。

美国的位置使它几乎不会受到外敌的军事入侵，中国的位置却使它千百年来屡遭侵犯。美国的安全问题是在国外，中国面临的

最紧迫问题则是在它的边界线上和边境之内。美国军队是在远离国土千万里之外的世界各地巡逻，中国军队操心的却是抗御入侵和压制国内的动乱。近年来的全球事态发展——冷战结束，苏联瓦解，联合国维持和平作用增强，文化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升高，世界市场日趋一体化，亚洲出现了若干个强国和国家集团——这一切都加强了美国对世界各地施加影响的能力。同样的这些事态发展却使中国近五十年来借以保护自身安全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长城出现了缺口。

这并不意味着，由于冷战结束，中国就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变得不再重要。诚然，西方不再需要像战略三角时代那样依靠中国以抗衡苏联。但是，中国现在是一个崛起的强国，它可以成为和平的新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它也可以打乱这一体系。它如果那样做，办法可以是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或东海、朝鲜半岛、中亚或印度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搞垮现今正在形成的以联合国及国际法为中心的开明世界秩序，或者支持一些国家无法无天的政权、出售武器和反对国际防扩散制度，或者破坏世界贸易体系和加快破坏世界生态环境。

从世界上新兴强国的历史来看，中国能否和平纳入世界体系，是不容乐观的。古典时代的雅典和罗马，16世纪的哈布斯堡帝国和荷兰，17世纪的法国，18世纪的英国，19和20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日本和苏俄，在崛起过程中都发生过暴力冲突。当崛起的强国加入世界体系时，它们要求重新制定它们不曾参与制定而它们又认为不符合它们利益的那些规则。已有的强国则感到难以跟新兴的强国分享领导权。已有的强国和新兴强国之间确实存在利益冲突，它们的领导人往往只看到这种冲突，而看不到它们之间更深层次的共同利益。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新兴强国都想称霸。如果说中国是一个资产雄厚的新兴强国，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易受攻击的强国，即使

它想要实行扩张或侵略，它也没有机会那样做。它的地理位置迫使它关注于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抗御外敌，而它的潜在敌手既多又强大，而且就在它附近。在设想中国的作用时，我们可以预期冲突，但不会是国际关系专家所说的那种‘争夺霸权的战争’，即中国谋求称霸世界的战争。^①

到冷战结束为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外政策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与苏联结盟（1949—1960）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而坚持革命的自力更生（1961—1972）；以及在战略三角中充当可移动的一角（1972—1991）。每个阶段都有风险，可是中国走过来了，保持了自己的领土和独立，而且在收复失地方面取得了进展。在这三次战略变化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连续性，那就是中国领导人在他们所看到的敌对的环境中，始终力图确保自己国家的生存，并确保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分量。

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紧接着苏联解体。在原苏联欧亚帝国的废墟上，政客们煽起了民族仇恨。这种形势使中国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及其中亚边界的稳定性受到了威胁。这种形势也使国际体系为之一变。苏联的崩溃使美国不受挑战地称霸世界。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美国的胜利展现出美国的军事技术比它的对手领先20年。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所谓七国集团）以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中，美国都安享首屈一指的地位。中国虽然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却不得不默认联合国在美国把持下奉行干涉主义方针，否则它就只好靠到那些受制裁政权的一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变本加厉地推行把别的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反军备扩散和国际人权制度，中国不得不参加进来，否则就会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作出代价巨大的妥协，而它对这一体系并不享有多大影响力。

为了在一个变化之中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地位，中国面临着根本性的两难抉择。为了起一个大国的作用，中国需要以合作的态度

对待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机制、世界贸易准则、国际人权活动、环保公约和军备控制制度。然而这样做，它也就批准了美国的主宰地位和减少了自己的行动自由。为了避免亚洲军备竞赛，中国必须鼓励美国军事力量继续留驻亚洲。可是它又认为美国是一个靠不住的和潜在敌对性的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形势下，中国为避免落后不能不更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但是它又担心在经济发达国家把持下的贸易体制中受剥削。中国希望利用国际稳定的时期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但自己的战略位置依然易受攻击，不能不保持自卫能力以对付可能出现的军事对抗，其潜在对手有日本、俄罗斯以及其他全球或地区性强国，其中也包括美国。然而自己加强军备，又会引起别国的惊恐，引发螺旋上升的不信任。

中国是一个足够大的强国，它的选择并不仅限于要么服从世界的规则，要么完全不予理睬。它可以参加有关贸易、人权、武器扩散及其他国际往来的管理制度，以便既遵守它们，又改变它们。既然世界秩序对中国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所起的影响是不相同的，中国参加的国际制度越多，我们可能就不得不越多地注意到它的利益。

中国对外政策的抉择既制约它的国内政治冲突，又受国内政治冲突的制约。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初期，国际环境促使其领导人选择了以苏联模式作为中国发展的样板。在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历次危机中，国内政治决定了中国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这些危机又影响了一些人的政治生涯以及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在邓小平领导下，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做到在经济上加入世界，而又在政治上不丧失自己的独立。

但是在共产党当政下，中国始终是由一小批领导人和外交官制定对外政策，他们不需要应付游说集团、议会、媒介或舆论。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纠缠于一大堆远方的问题，往往被迫在总的原则上作出妥协，而中国则与此不同，没有这样的麻烦。它的专制当局

能够奉行在地缘政治上富有战略性的对外政策，既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农业国的弱点，又利用它当年处于两大阵营边缘的地理位置。

学者们在解释国际政治时，是采用几种不同的理论角度：一种是经典的现实主义论，强调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之争；一种是新现实主义论，强调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寻求自己的安全；一种是新自由派体制论，着眼于国际合作体制的演化与影响。在解释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时，有些学者强调各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寻求；另一些学者则采用‘构成派’理论，强调各国的文化、观念、特性对其对外政策的作用；还有些人强调个人的认识对决策的影响，也有些人主张分析政策如何产生于行政机构和派系团体活动的过程。

我们参照了这种种看法，但主要是采取新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论二者相结合。^③我们理解中国的行为，是把它看作对自身安全的寻求，其背景是国际关系理论家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其动机则与其他国家相类似。我们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假定其决策人是运用理智，但不是说决策人的理智十全十美。我们承认，由于时间有限，信息不完备，认识有偏见，逻辑有缺陷，因而往往会造成战略上的失误。这种看法不同于那种从文化、个人、传统或感情的角度来解释政策的做法，其区别并不在于我们认为一国的对外政策永远正确，而在于我们期待从手段与目的二者的关系出发，能解释一国对外政策的选择。^①

我们并不忽视国际关系出现悲剧局面的情形。我们知道存在着‘安全难题’：一国试图加强自己的安全，很可能会削弱另一方的安全，引起反措施，这些反措施又削弱前一个国家的安全。^⑤国家利益是在国际社会之间失去信任的形势之下，在人为的界限之内予以界定的。对外政策即使是理智的，也只是在一定界限之内的意义上是理智的。

国际事务上最常见的误解，是把感情上或文化上的非理智因

素说成是基于战略动机的政策的属性。中国的行为尤其往往受到这样的误解，这大概是因为中国的战略处境跟其他大国大不相同，同时中国人觉得把他们行动的逻辑秘而不宣会比较安全一些。这样的误解对朋友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对竞争对手来说可能更加危险。

由于我们一般说来缺乏有关中国决策过程的内幕信息，我们通常是从行动退回去看动机，同时也考虑到公开的政策理由。不论是中国政策中始终一贯的主题，还是几次重大转折和明显的反常情况，看来都可以从战略得失的权衡的角度得到解释。这就是说，从中国的安全面临的形势、需要、强点及弱点的角度来说，它们都是有道理的，即使某些决策后来被证明是考虑欠周的，也仍然可以理解。对于那些跟中国打交道的国家的对外政策，我们也以同样方式加以分析。每个国家的安全都面临着挑战。每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有弱点和易受攻击，尽管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处境较好一点。并非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始终具有战略眼光。但是就我们所探讨的这一时期及有关国家而言，现实主义往往都可以作为解释中国及其对话国行为的依据。

在中国及其他各国，国内政治都是很有助益的第二点分析依据。我们经常记住一国的内外政策相互交织的这一联系。^⑥在每个国家，国内的考虑都影响到对外政策，在中国也许尤其是这样，我们将在下文中述及。如果不注意到中国对外政策对它国内利益的影响，那么，它的对外政策就会大多是无法理解的。

本书第一章谈中国的地理位置。在第二章，我们探讨由这一地理战略位置而来的对外关系的历史格局，它们对今天的政策仍有影响。第三和第四章分别谈中国与苏联和美国的关係，它们是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至关重要的两个大国。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都是围绕着中国与苏美两大国势力相抗衡和周旋的努力，而展开和演变，因此这两章中也谈及中国与中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

系。第五章和第六章单独谈中国与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主要邻国的关系。

从第七章到第十章，逐项集中分析中国的决策程序、国防、对外经济政策及人权。第十一章从国际的层面看它对边境地区及尚未收复地区的政策，其中涉及西藏、香港和台湾。第十二章分析台湾的对外政策，那里的“中华民国”力图保持自己对外政策的控制权，而又不公开反对北京坚持的中国必须统一的立场。在结论中，我们陈述的看法是，对于中国的崛起，若处置得当，它不一定构成威胁；同时，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如何形成一种建设性的方针，提出我们的若干建议。

第一章 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些人认为它将是下世纪的一个超级大国而与美国为敌，然而它在军事上是落后的，它一心关注的事是保持它的领土完整。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握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国”之一，而且是核俱乐部的一个成员，然而它没有与外国结盟，自称是第三世界的普通一员。中国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同时它又是世界十大贸易国中的一个。它的辽阔农村内地培育着一种内向的文化，而它漫长海岸线上的居民却具有世界眼光，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东亚所有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口的总和。^①中国是一个区域性强国，在全球起作用，从一个角度看它是站在世界事务的边缘，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站在世界事务的中心。

中国的行为常常令别人捉摸不透。它曾在千百年间自居于它自己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对欧洲的强权政治及其引起的国际法充耳不闻。今天它却捍卫着一种纯粹主义式的、起源于欧洲的国家主权观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联盟的一员，国民党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战后不久共产党当政，中国加入了苏联集团。后来它离开了那个集团，相当孤单，只在亚洲和东欧有很少几个友邦。到 70 年代和 80 年代，它又与美国形成一种准联盟关系。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常常起一种均势平衡者的作用，但是它坚持说它的外交政策是讲原则的。这些原则曾经以马克思主义辞令表述，而现在北京说在国际事务中不依意识形态划线。有人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未得到满足、企图打乱世界秩序的强国；也有人描绘它是一支维持现状的力量，说它赞成保持国际稳定，因为那是中国发展经济所迫切需要的。它既被看作一个内向的国家，又被看作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既能合情合理地权衡利害得失，又受文化价值观和感情驱动。它日益增长的实力既被看作在 21 世纪的亚洲保持稳定的力量，又被视为对世界和平的一个潜在威胁。

要理解中国的行为，就要看一看它在世界上的处境，它在维护自己的安全方面具有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它的领导人是怎样看待那些不利因素。首先不妨看看中国官方对中国政府外交的政策是怎么说的。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说自己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意思是说中国不与任何另一个大国结盟。中国的发言人说中国谋求和平，以便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中国说它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出发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这些原则是在 1954 年，当时中国正力图与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交往。那时提出这些原则，是为了加强与印度、缅甸之类中立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安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正跟本国共产党武装分子作战的政府。

今天，五项原则在措辞上一字未变，但目的有所不同。它们是为了取代美国式的世界新秩序——按照这种新秩序，那些往往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制度正在限制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扩散，限制那种干扰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并鼓吹全球一律的人权准则而限制主权。中国的主张则是强调国家一律平等，都应参与制定国际准则，其主权不可侵犯，不论大国小国、西方和非西方、富国和穷国、民主制或专制国家，都有权采取它们认为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而不论其做法是否符合西方的标准。五项原则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不可以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较弱的国家。

中国说它“永远不称霸”。在 60 年代“霸权”这个名词用来指苏联的扩张主义。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中国将这一概念扩展到越南对柬埔寨和老挝的控制。今天，中国官员使用这个名词是指美国企图在贸易、武器扩散和人权问题上，单方面地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别的国家。中国说它不称霸，也是为了告诉它那些较小的邻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不会使中国变成该区域一霸。

对于世界各地多数的争端，中国官员们的立场是：它们应通过和平谈判求得解决。在伊朗伊拉克战争、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争端以及前南斯拉夫冲突这些事情上，中国均持此种立场。在联合国，当表决那些为了扭转入侵、停止内战或制止恐怖主义而授权实施制裁或实行干涉的决议时，中国通常投弃权票或不参加投票。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若投反对票，就构成行使否决权，会得罪那些主张干涉的国家。不投票或投弃权票，中国就让若干次干涉得以实施，而中国自己又没有改变它主张不干涉的态度。

中国外交辞令中最经常谈到的一点，就是外交政策应当以道义原则为基础。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得道或失道的评论几乎总是无法避免的。比方说“国家利益”这个名词在中国话里听起来有点自私的味道，而不像一个中性的字眼。说外交政策以“原则”为基础，则显得落落大方，而不是显得僵硬。在 1972 年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它“acknowledged”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英文词并无承担义务的意味，可是找不到一个恰

当的中文词来表达。中国人提出而且为美国人所接受的中文词是“承认”；它就意味着法律上的承认。尽管现实主义往往是中国政策的一个特点，而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本领，但是，在中国政治中，如果不同时包含一种道义上的理由，这政治就不可能是现实的。

中国外交政策辞令长期以来都比较连贯，这有三个原因。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区性强国，跟利益遍布全球的国家有所不同。美国处处遇到难题，需要在彼此冲突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各个友邦互不相容的要求之间、历史形成的友谊与新的结盟之间或者老的原则与新的现实之间，作出棘手的抉择，而中国只是在亚洲才遇到这类麻烦。而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坚持的几条原则确实往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力所不及的地方，他们说反对大国干涉以及维护国家主权与平等，并不只是唱高调，而是代表了中国自己的利益。离中国越远的地方，中国的辞令和利益就越容易吻合。

其次，一个较弱的国家坚持说它的原则不可侵犯，就可以加强它的讨价还价的地位。只要北京能让别国首都相信它的原则立场不会改变，别国的外交官就不好意思再提出北京已经封了口的问题。即使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时，也可以说这不是让步，看来仍像是有力的，这本身就是力量的一个因素。

第三，即使中国的政策也有前后不一以及做交易的时候，也容易用辞令的外衣把这种情形掩饰住，因为只有为数很少的最高领导人和职业外交官掌管中国的外交。1966—1969年的文化革命暴露过一批领导人和外交官改变外交政策辞令和外交做法，但为期很短。在那以后，即使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出现国内不同政见

* 经核对，上海公报中的表述是美国“认识到”，而不是“承认”。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中则用了“承认”。——译注

的时候，外交政策也从来不是一个重要的辩论话题。持不同政见以及发表非官方意见的人，与官方人士的区别主要仅在于，他们比较公开地承认中国要成为 21 世纪一大国的野心。

如果以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直接来源于政府所持有的原则，因而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透明的，那就错了。公开宣布的政策之所以获得生命力和意义，是看它们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具体情况。对这些原则可以随国家利益的需要加以解释，甚至可以做到掩盖政策大转弯。归根到底，中国外交政策的辞令和战略之所以能保持连贯，是因为它们适合于中国所处的逐渐演化之中的地缘政治形势。

一个亚洲国家

中国在亚洲的位置决定着它的外交的轻重缓急。日本和朝鲜，越南和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不遥远，而是近邻。由于越南的经济麻烦而外逃的难民，不是乘船进入中国，而是从陆地上越境。柬埔寨这么一个小国受到外国入侵，不是远方的一个悲剧，而是近在咫尺的一种威胁。中亚新共和国内的氏族战争涉及到他们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亲戚。朝鲜半岛的战争前景在中国引起的忧虑，远超过中美洲、中东、北非及前南斯拉夫实际发生的战争。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外交来说，都是重要人物。中国人密切注视着亚太经济合作论坛这一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外交潜力，而在美国人心目中它只是一个外围的团体。我们称之为“中东”的那个地区，在中国人看来是“西亚”，只是从伊拉克和伊朗穿过中亚直到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这样一个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而已。

对于一个全球大国来说，距离远近不是那么重要。美国虽然位于北美，但也关注亚洲、中东和东欧的事态，因为它的投资、军事基地、盟友及原料供应地几乎遍布全球各地。中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

没有全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不至于因为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而感到受威胁。如果说中国也关心中东和东欧，那不是因为它依赖中东的石油（虽然它也买一点），也不是因为它可能被拖进东欧的战争，而只是因为那些地区的事态直接关系到美国、俄罗斯和日本这样一些国家，中国在自己地区必须跟这些国家打交道，因而受到间接的影响。

东亚虽然与欧美相距遥远，但在战略上并不是一个僻远而宁静的地方。冷战期间，在东亚发生的事件包括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印度支那半岛一系列战争，以及中苏边境冲突。就某些方面而言，冷战外交在亚洲比在欧洲更为复杂。亚洲地域辽阔，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多种多样，亚洲国家不曾分别结盟而划分为像北约和华约那样的两大营垒。相反，它当时是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场所。最终，在亚洲出现过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但中国在外交上还得应付一些较小的三角：中、美、日三角，中、苏、日三角，中、苏、越南三角，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三角，中国与南北朝鲜三角，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等。还有四角关系，如中、越、柬和泰国三角，中、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及另一些更为错综复杂的格局。亚洲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多层面的，比欧洲更富有流动性。

除了印度支那以外，冷战的后期在亚洲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在 1958 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之后，中美军事冲突的危险减小了。美国 1975 年在越南失败以后，东亚大部分地方出现了和平与稳定。东南亚的革命运动（其中有许多曾受到中国支持）转入低潮以后，一些国家迅速抓住了发展经济的机会。急剧的发展使得不少地区由第三世界进入了发达世界。东亚和东南亚如今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四分之一。^②二十多年的区域稳定和发展，使中国意识到威胁逐渐减少，有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机会。

中国位于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一个大国，周围则是一些较小的

独立、自信的国家，它们在民族上和意识形态上大多不同于中国。中国与邻邦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相互猜疑。在历史上，中国的势力曾扩及许多邻国，因此它们今天对中国力量的崛起仍存有戒心。还有一个情况使这种疑心加剧，那就是在它们国内有大量的华人，它们常常以为这些华人可能充当第五纵队。

一个有众多邻邦的国家

中国的直接邻邦之多，超过除了俄罗斯以外的任何国家。在陆地上，自东北面顺时针方向而下，与中国接壤的有十四个国家：俄罗斯，北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在海上，中国声称拥有的水域或实有的领海，与邻邦声称拥有的水域或实有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这些邻邦包括上面提到的某些国家，外加以下六国：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此外，中国旁边还有台湾、香港（1997年7月1日之前）和澳门这三个实体，中国声称对它们拥有主权而尚未实际控制。从势力范围的界线来看，中国还跟美国隔太平洋相望。如此算来，中国的直接领土领海利益涉及到另外的二十四国的政府。

中国的陆地边界之长在世界上占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中苏之间 4 000 英里的边界，在长达 25 年的时期内曾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不友好的边界，边界两侧一度部署有一百五十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双方都有核武器。两国在 80 年代末开始从边界裁军和恢复边境贸易。但是苏联解体后，这一边界上的邻邦增加到四个，即俄罗斯和三个中亚国家，同时蒙古也摆脱了俄国人的控制。在这一方面，打交道的对手由一个变成了五个，其中每一个都有可能由于民族、贸易或安全上的问题而跟中国制造紧张。

在 60 年代，中国跟蒙古、缅甸、不丹、锡金（现在并入了印度）、

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缔结了边界协定。90年代,它又跟老挝、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签订了边界协议。中国跟一些国家仍然有尚未解决的边界或领海争端,其中包括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北朝鲜、越南、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③在所有邻国中,中国仅仅跟两国,即苏联和北朝鲜,有过同盟关系,另外跟巴基斯坦和缅甸保持稳定的盟友关系。中国跟苏联的同盟后来变成了敌对,而中国跟北朝鲜的同盟关系则由于中国现在跟南朝鲜建交,而变得紧张。

在本世纪,中国跟美国、俄国、日本、印度、越南、南朝鲜和台湾发生过军事冲突。它们现在仍然是潜在的军事对手。还可以想象中国也可能跟北朝鲜动武。上述八国的军队均名列世界25支最大军队之中。美国与自己的紧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军队在兵力上为六比一,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而中国则不一样,尽管它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但即使撇开较远的美国不算,七个主要邻邦的兵力加在一起,竟比中国兵力多一倍。

中国的边界易受入侵而难于防御。^④漫长的海岸线易遭海上入侵。内陆边界大多是山地,寒冷,难于驻军,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不一定都靠得住。除了越南和北朝鲜一度充当过缓冲国以外,在潜在入侵者的进军路线上,中国都没有缓冲国。中国最可能打仗的战场是在自己境内,而不在海外,这一点也与美国不同。

中国的计划人员曾经在二三十年里让南方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人口加在一起有9600万人)放慢经济发展,因为估计到一旦国民党或美国入侵时,中国的空军会迫不得已而轰炸这些地区。为了阻止入侵者占据滩头阵地,中国军方曾计划轰炸本国的领土。1965年东京湾(即北部湾——译者注)事件后,越南形势紧张,毛

• 此处原文为“eight states”。——译注

泽东下令将北方和东北已建成的工厂搬迁到西部和西南的山谷，建立了一道“三线”，分散隐蔽，防止敌人空袭。在一段时间里，国家工业投资有三分之二花在这些僻远地区。生产率下降，运输费用上升。^⑤

战争今天看来不大可能，但从长远看，中国国防计划人员仍不能排除漫长陆地边界和海洋边界任何一处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这一战略处境恰恰与美国相反，美国的本土与任何可设想的敌人都相距十万八千里。在国防计划中不必认真操心边界遭受入侵。

一个大陆国家，人口众多，贫穷，而且民族成分复杂

中国领土面积跟美国差不多，而人口有 12 亿，比美国多四倍以上。中国人口较集中的地区仅占其领土的 22%。居住的人口则占总人口的 66%。^⑥这一中心地区的大小，大致相当于美国从马萨诸塞州至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沿岸诸州加上内陆的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和亚拉巴马三州，但中、美这两处人口的比例，却是 5.5 比 1。中国这一中心地区大都是肥沃和灌溉良好的平原及谷地，产稻米和小麦。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向西延伸的距离约在 150~600 英里之间。在沿海，只有很少一部分地方有山地屏障。日本入侵时，在 1937~1938 一年之间就侵占了中国这一中心地区的一多半。在现今动用“灵巧”炸弹、导弹、空运部队和核武器的时代，这一地区更容易遭受袭击和破坏。

从中心地区再往西延伸 2000 英里，则是另一个中国：地势高，寒冷，偏僻，贫穷。在中国 30 个省区中，西部的 13 个占中国陆地面积的 78%，人口仅占 34%，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不到 22%。中国的矿产资源大多在西部，占总人口 8% 的少数民族也大多在这一边。除了长江沿岸和成都平原以外，西部大多是山地，居民贫穷。

在西部的少数民族中，许多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是不一定可靠的，在关系上有时紧张。名义上，北京给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从省级到县级的 159 个地区以有限的自治。^⑦但它们大部分实际上是受汉族驻军控制。对中国沿海和平原地区而言，西部是大后方，而且在历史上充当过缓冲区，使中亚及其以西的政治风暴吹不到中国。在历史上，主要为汉族居住的中心地区向西部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以确保控制，在第二章和第十一章将谈及这一情形。

过去两个世纪，中国人口增长很快。在 18 世纪中期，全国人口约为 1.8 亿。^⑧尽管战乱和饥荒频仍，但农民不断精耕细作，人口仍然增长。在气候允许的地方，农民由一年一季稻进到两季，从两季进到三季。上一季尚未收割，就开始种下一季，刚收割过的田地马上翻耕，用手工插上新的秧苗。有些地方，农民手工养蚕，采集桑叶，一天喂好多遍。在一块田里，高秆和矮秆作物以及早熟和晚熟作物交织在一起。

这样的经济及其技术不曾支持中国向境外出兵，也不需要依靠国际贸易和外交。这一经济生产的东西没有多少可以销往国外，也不需要国外生产的多少产品；攒不了钱向国外投资，也没有什么技巧吸引国外投资。除了战乱和天灾时期以外，这一经济是繁荣的，但只能在人口压力和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这两者之间勉强保持平衡，无论多少外援都不足以使它实现现代化，除非它自己首先从经济闭塞的状态下解放它自己。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一段时期，当国际经济对中国出口产品相对开放时，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曾有所发展，但发展不快，不足以带动内地。中国想要使国家经济起飞，除了自力更生以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只能从小农户经济榨取资金以用于工业投资，1949 年以后，当权的中国共产党试图用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仅仅在头十年得到过苏联技术和贷款的援助。在中苏决裂之后的二十来年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实际上与世界经济体系无涉的大国。^⑨